



马旷源民族文化论集

彝族文化论集

马旷源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马旷源民族文化论集

彝族文化论集

马旷源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旷源民族文化论集 / 马旷源著. —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695-653-3

I. 马… II. 马… III. 少数民族-民族文化-云南省-文集 IV. K280.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6707 号

责任编辑: 黄显松 汤彦

特邀编辑: 黄粤榕

马 旷 源 民 族 文 化 论 集

(彝族文化论集·《西游记》考证·傣族文化集·回族文化论集)

马旷源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制版印刷: 云南省曙光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32

印 张: 12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5-653-3

定 价: 200.00元 (共四册)

目 录

滇中文化论	(1)
毕摩经亟待抢救	(13)
密宗与云南少数民族巫术	(17)
彝族古代诗话	(76)
彝剧源于“娱神”考	(91)
论彝族儿童歌谣	(100)
滑稽的哀歌	(111)
“大黑天神”的由来	(118)
《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	(121)
读普珍的两本书	(124)
《彝族文学论稿》后记	(129)
倾斜的天平	
——当代云南彝族文学谈片	(131)
李乔论	(141)
形象的历史感与鲜明的民族性	
——李乔《破晓的山野》读后	(155)
漫评《未完的梦》	(162)
“远”的怀念——悼李乔	(169)
不老的常春藤——李乔轶事	(174)
读张昆华	(176)

“老张哥”	(179)
“咬住青山不放松”——读袁佑学作品散记	(182)
附：超越自己——漫评《峡谷下面是大江》	(186)
陶学良的书	(188)
评杨知勇的三本书	(192)
田野调查的新收获——《从图腾到图案》读后	(200)
读郭思九	(205)
《高翥映评传》读后	(208)
游国恩笔下的云南文化	(211)
《雪涛小说》中的滇事	(214)
丁文江：《漫游散记》	(218)
罗常培：《苍洱之间》	(222)
《虞初新志》中的滇中传说	(225)
水与火的民族	(230)
啸斋题跋	(240)
《彝山情歌》序	(254)
祝贺《彝族法律文化研究》出版	(257)
《背负沉重的大山》序	(260)
《山里的诗笺》序	(263)
《山魂》序言	(265)
《赵星耀彝剧剧作选》跋	(266)
欢乐的彝族年	(268)
西云土主庙	(269)
核桃箐·赛装节	(271)
石羊访古	(273)

附 录:

文章旷源波澜阔

- 著名回族学者、评论家、作家马旷源印象 … 张承源 (275)
- 李乔致作者信 …………… 李 乔 (288)
- 张昆华致作者信…………… 张昆华 (297)
- 文 摘 …………… 龙 吟 (299)

评论的地域关照与滇中文化论

- 马旷源的文学评论面面观 …………… 李光辉 (300)
- 后 记…………… (305)

滇中文化论

—

广义的滇中，应指包括昆明、楚雄及大理之一部的广大地区；而狭义的滇中，则是指以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中心的以彝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区，包括楚雄州全境及祥云、禄劝、宁蒗等地。这一区域位于哀牢山、乌蒙山两山之间，横跨金沙江流域，属红土高原区。

这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在人类尚未诞生之前，曾是恐龙的繁衍之地，因而也是恐龙的墓地。据专家考证，禄丰恐龙生活在 1.8 亿年前的晚三叠纪，在恐龙家族中处于最早的祖先地位，是阐明恐龙类起源、演化和发展的珍贵化石证据。自 1938 年发现以来，经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先生定名为“禄丰蜥龙动物群”，迄今已发现古脊椎动物化石 45 种，是我国目前有关古脊椎动物化石最丰富、最完整的动物群之一。杨钟健先生曾肯定地指出：“从脊椎动物化石的角度，三叠纪和侏罗纪之间的界限，很少有像禄丰地区这样清楚的，而且与世界其他有关地区情况也很吻合，其中的脊椎动物化石地层完全可以对比。”^①在已经初步建成的禄丰恐龙博物馆里，我们至少可以见到五具复原后的恐龙尸骨化石——最早的恐龙化石。

在人类诞生之初，这块土地上就有了人类始祖的足迹——

^① 李康颖：《禄丰蜥龙动物群简介》、《彝州文物资料》，楚雄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编印，1988 年版。

“卞氏兽”、“腊玛古猿”、“蝴蝶人”、“东方人”、“元谋猿人”，从而揭开了人类文明的历史。“卞氏兽”，1938年发现于禄丰，是爬行类动物向哺乳类过渡的中间类型。它的发现，为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提供了第一手实证资料。腊玛古猿，最早发现于印度北部山区。1975年开始在禄丰发现，至1980年为止，共出土腊玛古猿牙齿300多颗，完整的头骨三个，上下颌近百块。三个完整的头骨为世界上所绝无仅有。禄丰腊玛古猿生活的年代距今约1200万年~800万年之间。它的发现，为研究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打开了大门。国际学术界并且由此得出结论说：“由猿向人的进化过程首先是在中国和亚洲开始的。”^①禄丰发现的腊玛古猿被科学界定名为“腊玛古猿禄丰种”。

元谋猿人生活在170万年以前，已经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它们不仅会制造工具，还学会了用火，为恩格斯“劳动创造人本身”的科学论断，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从禄丰到元谋，直线距离不过百里，从禄丰腊玛古猿到元谋猿人，人类历史的进程竟达一千万年之遥。在这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最终举起了火把，这冲决黑暗与愚昧的智慧之光，开创了人类文明历史的新纪元。这一步的迈出是何等的艰巨，又何等的伟大啊！元谋猿人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质的飞跃，并把人类用火的历史由60万年前的“北京人”整整向前推出了100万年之久。继元谋猿人之后，元谋地区的古人类研究又有重大进展，先后发现了距今约250万年以前的“东方人”化石，距今约400万年前的“蝴蝶人”化石，从而使得禄丰——元谋的古脊椎——人类史研究，呈现出一种渐进而清晰的层次感。其中，“东方人”是早于元谋人阶段的另一个人类进化阶段，发现地伴随有少量人工制作的骨器。而“蝴蝶人”

^① 张家华：《从史前跨入文明的门槛》、《彝州文物资料》。

的化石，从牙齿分析看仍属腊玛古猿类，但在发现地又有人工石器同时出土，所以也有专家认为，“蝴蝶人”已进入了元谋猿人的进化阶段。当然，结论须待地下发掘物的进一步证实。^①

事实证明：滇中地区是人类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

二

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滇中是各种文化类型执著而又古老的交汇点。凭借金沙江河谷的牵引，氏羌文化、百越文化南来，由此过境继续南下。彝族民间珍藏的毕摩书《指路经》，详细记录了彝族先民迁徙的路线。如禄劝《指路经》中的一段：“河边有木舟，木舟有新旧，旧舟祖先用，新舟为你备。渡河达彼岸，朝着正前方，放眼向前望，见涛布涛甸（今寻甸县淌甸）。骑马驱邪魔，迈步往前行。到涛布涛甸，放眼向前望，看见诺吐山（今巧家县达朵山）。骑马驱邪魔，迈步往前行，到了诺吐山，此山像马鞍。马停诺吐山，放眼向前望，见莫姑通合（今巧家县磨姑）。”由居留地禄劝送魂，一直走抵分支地昆明。^②

傣族的先民，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越人。越人，位居长江之南，为古代华南的最大种族之一，他们与北方的华夏族、氏羌族、东夷族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百越族的一支，即今之傣族。至今，金沙江河谷仍留有少许傣族村落（如大姚县的湾碧；水仁县的万马、永兴）与大量傣族文化的残迹，其中，最明显莫过于元谋人的诞生地——元谋县所残留的大量以傣语命名的村寨了。

对于傣族文化在古代滇中及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

① 张家华：《从史前跨入文明的门槛》。

② 《指路经》，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用，苏联学者B·N·柯尔涅夫曾经论及：“印度、中国、阿拉伯和高棉古代文化曾对整个印度支那半岛诸国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演变产生过巨大影响，这里的各个民族不同程度地，但却普遍地接受过以上各种文化——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二者之中，又以印度文化的影响为最大，最明显。”“从十七世纪初起，泰国、老挝出现过大量的故事集和史诗集，像《玛哈布拉杰》、《拉玛雅那》、《班卡丹特雷》，以及神话意味极浓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其中许多作品是对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古典名著的模仿之作。在这些‘民间的、本土的’作品里，杂糅进不少印度和中国佛教文学的成分，因此人们又称它们为‘从大海上漂来的和从大陆上传来的’，即从印度和中国等地传播而来的作品”。“渗透了佛教精神的印度古典文化，在亚洲中心地带，例如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西藏是一个典型）一度流布之后，又以新的方式返流到东南亚各民族中；即印度文化在亚洲大地上旅行一周之后，又向邻近故乡的土地回归”。^①

三苗（炎帝族）文化南来，或继续南下长驱直入东南亚，或滞留楚雄，将中原文化带入滇境，留下了后裔，也留下了感天动地的史诗《涿鹿之战》（夏扬搜集整理，德宏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史诗共分四部，第一部“创世篇、洪水篇”，第二部“涿鹿之战”，歌唱了苗族古代的五位部落英雄，其中第四章为涿鹿之战的正文。蚩尤在古歌中称作“格蚩爷老”（“格”是尊称，“爷老”为长老、酋长。连缀为：尊敬的长老蚩尤），是被当作民族英雄来歌颂的。涿鹿战败，蚩尤带领人马离开了祖辈生活的“当里姆平原”上的“老古”，退到“老梨平原”。第三部“迁徙”，详细记载了苗族先民的南下路线。首节“离开

^①（苏）B·N·柯尔涅夫：《泰族民间文学研究历史综述》、《民族文学研究集刊》（一），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印，1987年版。

北方”，歌中唱道：“远古的时候，花苗白苗都住在北方平原。那里有一座江普城……到了那一年，闪岛觉地福（注：民族名，据说指汉族）来打江普城，天气十分晴朗，城外庄稼地里，我们还在犁地，犁还插在地里，牛还放在山上吃草。我们挖的挖，犁的犁，闪岛觉地福打来了，我们丢下犁就跑。可惜啊，宽阔美丽的江普，我们一边转一边看，我们恋恋不舍。可惜啊！江普那么宽阔。可惜啊！多么美好的地方。”二节“长江中下游一带”：一路且战且退，进入“弯曲的第格朝畔”（今贵州省威宁一带）、“安雨使陆底”（今湘西一带）。三节“从贵州到云南”，直达古歌流传地武定禄劝落户。第四部“开发边疆”，记苗族先民在云南开辟草莱的英雄业绩。

楚文化南来，将楚国丰富多彩的巫觋文化带入云南，与本地原始宗教合流，从而创造出了滇中自成一体的神话与宗教。这方面的史料十分丰富，如庄蹻开滇，“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的史实。

楚雄地名的由来，也可以从庄蹻的史实中找到。楚雄旧名“威楚”。《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庄蹻“以兵威定属楚”。一般认为，这就是“威楚”地名的来历。又有史籍记载说：庄蹻“王滇”之前，滇中楚雄一带早已隶属于楚国。“春秋中叶，楚国开始在楚雄设官置吏，管理丽江黄金的开采。”“楚国黄金出于丽水，其地东距楚都江陵极为遥远，楚王为了管理这里黄金的开采和东运，必须在这里派驻一个亲戚作为他的代理人，这样一个代理人最初的驻地是在今云南省的楚雄。”丽水即金沙江。《韩非子·内储说上》云：“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明言丽水流域属荆楚所领有。此外，滇中地区又是楚国的流放地。“云南早在春秋之际，已属于楚国的领域，楚悼王时，吴起相楚，已有一批世袭贵族被流放于楚雄一带。楚雄又为楚开采

金砂于丽水的转运中枢，其经济、文化之交流，积之已久。”^①惟其如此，司马迁才说：“秦灭诸侯，惟楚苗裔，尚有滇王。”

庄蹻入滇，爨祖“选择双柏为其建立城邦国家之所，以其靠近楚雄。楚雄原为楚设官置吏之所，自楚之衰，黄金运输中断，但此地仍为进入滇南（西？）之咽喉要道”。^②《南安州志》载：爨祖瓦晟吴于双柏设县前，立栅居于双柏云龙苍山。而庄蹻部将小卜将军则继续向滇西方向发展，战死之后，葬于姚安。清光绪《姚州志》卷五《秩官志·忠烈篇》载：“小卜，楚庄蹻将也，从庄蹻略地，战没于姚，蒙人立祠于墓以祀之。”墓今存。

楚文化影响于乡土文化方面的一个显著例子，就是彝族的土主信仰与白族的本主信仰，如楚雄西山“西灵圣母”（一称“陶凹奶奶”）。传说中的“西灵圣母”是一位巫医一体的彝族妇女。清朝雍正年间，皇后害了眼疾，久病不愈，一夜突得奇梦，梦中见一彝族老妇左手持司刀（彝族巫师常用的一种法器），右手拿羊皮鼓（亦为跳神时所用法器），为她治病。老妇且跳且扭，口中念念有词，将一口清水喷向皇后。皇后醒来，眼疾霍然而愈。于是，下诏封陶凹奶奶为“西灵圣母”。“西灵圣母”应属巫神。张毓吉先生论及此种现象时，明确指出：“把旧时楚雄巫风与当年楚国的巫风相比较，大有相似之处。旧时楚雄巫风中‘跳神’的‘香通’，与‘九歌’中的巫覡很相像。”^③

楚雄万家坝铜鼓，已证明为年代最早的铜鼓，与此为代表的铜鼓文化，影响及于东南亚。文物工作者认为：“万家坝编钟

① 马继孔、陆复初：《爨史》第106～10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马继孔、陆复初：《爨史》第114～11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张毓吉：《巫风·楚俗》、《槐下集》，金沙江文艺丛书，1987年版。

和越南编钟完全属于一种类型，它们二者是同一种范模内制造出来的同一种器物。万家坝类型的羊角编钟在越南出土，这绝不是偶然现象，它说明春秋战国之际，滇中楚雄一带发达的青铜文化对越南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越南羊角编钟应该是受万家坝青铜文化的传播和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器物造型。如果我们判断符合实际的话，那么，在春秋末到战国初年，丝绸南路就已存在，它为大西南的开发，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对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并进一步指出：“万家坝出土的几类器物与晋宁石寨山、越南及泰国青铜文化均有不同程度的内在联系。首先是铜鼓，它在滇中、洱海之间产生，经石寨山青铜文化的发展，传入红河流域后再以此为中转站进入越南。另一路经弥渡、云县沿怒江、澜沧江中、下游传入缅甸和泰国。据目前资料表明，越南、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均先后发现过公元前五世纪以后的石寨山型铜鼓。这类铜鼓的源流归入万家坝类型现已基本成为定论。”^① 万家坝铜鼓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也是很明显的，据徐中舒先生考证：传说中的岷山庄王，“其属地应在金沙江流域楚雄万家坝地区。后来为了保卫丽水矿区乃北迁于邛崃山零关地区，藉以控扼旄牛夷的南侵。”^② 岷山庄王为楚国后裔，一说即庄蹻，一说为爨襄，已不可考。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朝张骞出使西域，见到由印度转售大夏的蜀锦、筇竹杖，因而得知在神秘的南方，有一条古老的通道直达西土。这就是今天被史学家们称作“南方丝绸之路”的古道，也是最早联结东西文化的纽带。一般认为，古道

① 张家华：《万家坝部分青铜器与东南亚青铜文化的联系》、《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据《爨史》第110页。

大致有两条不同的走向，一条出西昌渡金沙江入滇，一条自昭通南下。而其交汇点，又恰恰是在今天的楚雄州境内。由此南下，两道合一，“度博南，越兰津，渡兰仓”，进入东南亚。循南方丝绸古道，中印文化得以在滇土进行交流。以佛教而论，一路自南而北，如密宗，在南诏、大理国时期，曾一度形成过巨大的影响。张旭同志指出：“8世纪末、9世纪初，即有印度阿吒力僧经西藏到达大理地区传布密教的。赞陀崛多也是印度摩迦陀国阿吒力僧，接着于南诏劝丰祐保和十六年，即公元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从同一条路线经西藏到南诏。南诏王劝丰祐对他极为信任，封他为国师，又以妹妹越英嫁给他。自后，他就凭借南诏上层政治权力和金钱布施，大修佛寺，塑佛像，吸收白族门徒，在群众中大肆传布，密宗因之蓬勃兴起，历代为南诏、大理‘国师’。”^①在民间传说中，就有了观音降罗刹的传说；有了以巫师斗法为中心的著名故事《望夫云》；甚至于连密宗的大护法“大黑天神”，在进入滇中以后，也经彝、白人民将其改造成了舍身忘己，救民于水火的英雄，被奉为土主、本主供奉（这个地方化民族化了的民间故事中，甚至还糅入了若干道教成分，是一个名副其实三教合流——密宗、原始宗教、道教——的产物）。而在实物方面，则有剑川石宝山的“阿媧白”石雕群与大姚的磐锤塔。对于密宗在滇中地区的兴盛，刘小兵同志指出，“密宗本来就是巫术”，而在“佛教传入南诏以前，南诏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巫鬼文化，巫鬼信仰充斥于南诏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即所谓‘一切信使巫鬼’”，因而使二者一拍即合。“密宗在南诏兴盛发展的过程就是与南诏土著文

^① 张旭：《佛教密宗在白族地区的兴起和衰落》、《南诏史论集》，大理州南诏史研究学会编印，1986年版。

化相互融合涵化的过程。”^①此说是颇有见地的。

密宗在滇中地区的代表神为观音，为大黑天神，而以前者称首座。美国学者海伦·B·查平在研究了大量云南的观音造像后指出：“云南的观音像是按照来自7世纪至13世纪在马来亚半岛昌盛繁荣的室利佛逝（三佛齐）王国的观音像模式仿制的。”对于南诏铁柱和柱顶的“神鸟”，他说：“远东立于柱（塔）顶的神鸟与大量的希腊、印度和基督教的立于圆柱或方柱（类似方塔）上的鸟类在艺术上是颇为一致的。我们相信，立于‘世界之轴’的太阳鸟最先确定为远东类型（而且可能是佛教类型）。”^②结论与苏联学者柯尔涅夫可谓异曲同工：“云南人给神披上了人的外衣，或者说，使神成为有血有肉能在地面上行走的人，而坚定不移地崇信供奉。他们在思想意识和艺术风格两方面，将亚洲各个地区联结起来，并使我们领悟到，云南是最为有趣的熔炉之一，印度、西藏、尼泊尔、缅甸、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各种特质都在这一炉中熔化混合。”^③滇中与东南亚地区经由佛教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可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中看出来，白诗云：“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德宗立仗御紫庭，氍毹不塞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曲终王子启圣人，臣父愿为唐外臣。左右欢呼何翕习，皆尊德广之所及。”（《骠国乐》）^④。骠国在今缅甸一带，贞元十七年经南丝路进京献乐，白居易因而有此记。唐时又有《菩萨蛮》乐，李白曾依此调填词。“菩萨”明指佛教，亦由骠

① 刘小兵：《滇文化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美）海伦·B·查平：《云南的观音像》、《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 （苏）B·N·柯尔涅夫：《摩族民间文学研究历史综述》。

④ 《白居易集》第51页，岳麓书社，1992年版。

国经滇地进入中原。姚安德丰寺内藏有汉白玉佛坐像一尊，玉佛身披袈裟铺于座边，右肩袒露，手结火天印，打坐盘足于椭圆座上，鉴别为印度佛教密宗造像，据载为缅甸僧人带来。^①此物与大姚白塔，同为密宗留遗滇中的重要代表物。

佛教进入滇中的另一路自北而南，如中国化、知识分子化的禅宗，其代表地可举鸡足山、武定狮山，其代表人物可举画僧果成与诗僧担当。担当诗荒寒峭拔，有句云：“我骨偏能傲我穷，一年无日不春风。除却病竹枯松外，红紫何曾在眼中。”又云：“孤灯照影不胜情，近水茅堂冷气生。不待西风摇落尽，笔尘动处有秋声。”^②禅意盎然。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受丽江土司木增聘，重修《鸡足山志》八卷，另撰《鸡山志》三小册，在“鸡山志略二”中专记“诸寺原始”。谨抄“寂光寺”一则：

嘉靖间，古德定堂禅师创建。檀越李中谿、苏大云、赵雪屏，三先生俱翰林。又居士杨碧泉，皈依禅师，捐资建造。后嗣用周禅师，大兴宏敞，又建大觉寺，请无心禅师主持。后嗣野愚大师现住静，见晓现住南直中峰，克心现住持。^③

禅宗进入云南，出于中原统治者的需要。明太祖在荡平段氏势力之后，特申禁令：不许传授密宗。其意义首先是为了从根本上摧毁段氏势力的精神支柱——国教密宗。清初平定吴三桂后，康熙皇帝再次重申：“阿叱力非释非道，其术足以动众，其说足以惑人，此固盛世之乱民，王法所必禁者也。”^④此外，南明小朝廷窜逃滇中，当失败之后，大批随行官吏及士大夫削发为僧，也大大助长了禅宗的势力。诗僧读彻、普荷（即担

① 肖林：《南方丝绸之路楚雄段论述》、《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

② 蓝华增：《云南诗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 《新纂云南通志》，第61册佛教（三），第6页。

当)、朱昂等人皆为此中代表。以画僧果成为例:“果成,晚明清初人,六岁出家华严寺(位于今西云乡紫溪山上,明隆庆三年建,已毁)。修道之余,借书画以陶冶性情。……尤以画兰见长。青壮年时期,仅凭一领袈裟,一支画笔,云游四海,浪迹名山古刹。……清光绪初年,果成罢游回楚,率徒弟归三元宫。”时人赞曰:“翠竹黄花性,传闻早出群。钵分龙井水,锡挂鹿城云。作画通禅意,谈经远俗氛。楚江众弟子,遥拜墓门熏。”^①特意拈出一个“禅”字,以证果成画风不俗。

南诏当盛唐之际,与有唐一代全方位对外开放,博采西域文化的时代精神同步,向北吸取汉文化的精华,向南学习以印度作为主体的外来文化,从而使得一个落后封闭的地区和民族,走向繁荣,走向亚洲,并为后来堪称兴旺发达的彝族古典文化和白族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密宗、禅宗之去去来来,虽一度潜踪,然其蛛丝马迹与潜移默化之功,却在不经意中渗透于滇中文化的深层。纵观云南历史的发展,开放性应是滇中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

就物质文明而言,远在印度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年至前185年)初期的著作中,就曾提到了“支那成捆的丝”。而张骞之发现南方丝绸古道,也是因为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了中国出口的蜀锦与筇竹杖。反转来说,外来的琉璃、宝石,很早以前便成为我国西南地区贵族们的装饰品。在近年发掘的滇人古墓葬中,就发现有产于巴基斯坦和伊拉克的蚀花内红石髓珠、彩色琉璃珠饰和有翼虎图案的银带扣等。^②实际上,《后汉书·西南夷传》已载:永昌物产中有琉璃和蚌珠。“琉璃为梵

① 《楚雄人物·果成》,楚雄州地方志办公室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刘小兵:《滇文化史》。